

来上海近 5 年，蒋薇只到过市中心两次，更别说去参观上海博物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单单看到东方明珠，就让这个孩子兴奋了许多天。她说：“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和城里孩子一样，进少年宫看一看，哪怕就在宝山区少年宫看看也很满足。”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穷孩子的心愿，也没人来帮助她实现。我们的社会不感到羞耻吗？

教育是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大事，不论是谁接受教育，不论在哪儿接受教育，那只是过程的差别，升学率就不应有公办和民办之分。

夹缝中的贫民学校

人要脱离蒙昧，就要掌握知识，人要改变命运，也要掌握知识。掌握知识当然要到教授知识的地方去接受教育，今天的社会，即使你对一个小孩说，我想读书，孩子也会准确无误地告诉你，那就到学校去。

这本来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就像我们知道每天只要天气晴朗，太阳就会从东方出现一样。但是，要真正在生活里体验这个道理，那就不简单了，有谁会想到，中国大陆的教育，今天民办学校是在怎样艰难的环境里挣扎，而要为平民子弟办一所学校那更是多么的不容易。

中央电视台曾播出一个耐人寻味的事件，北京有个研究生和他的两个伙伴为民工子弟办起了一所学校，因为学校是平民的，条件相对简陋一些，学费也很低，他们承诺进该校的学生可以先读书，满意了再交学费。学校收了 400 多名小学生。民工和他们的孩子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终于有自己孩子能读书的学校了。

可是有的人却不乐意，他们说这所为民工子弟服务的学校是“黑学校”。领头的人打着教育的名誉，带上执法队，有公安、有联防，有工商和税务，一块儿去查封那个学校。学校的办学者据理力争，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都来了，自发地起来保卫学校，因为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都知道，学校一旦没有了，这些读书的孩子就会失学。

僵持了几天，执法队白天进不了学校，便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冲进学校，大肆打砸抢，第二天当小学生和他们的老师来到学校时看见的是疮痍满目，一派被打砸抢后的惨状。好端端的一个学校就这么被毁了，因为它不是贵族的而是平民的。因为它没有什么后台和背景，就是几个热血青年想为民工子弟们做点儿好事，他们的老师和到这里读书的孩子一样，都没有什么钱。孩子们背着书包，到他们的学校上课，看见的是往日里书声朗朗的学校变成了狼籍的废墟，孩子们抱在一块儿失声痛哭。

几千年前孔孟就知道教育的重要性：学而知礼节然后知荣辱。

高高在上手里握着人民给的权利的一些官员，挂着公务员的名义，学历是有了，头衔也有了，可是执起法来却不懂什么礼节，也不知什么荣辱，他们的理念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2002年12月28日，酝酿4年之久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终于正式出台。该法案首次明确规定“民办学校出资人可以取得合理回报”。就是这部法律也是妥协的产物，是平衡各方利益的结果。据报道，仅仅为了“合理回报”还是“适当补偿”，立法者就曾展开激烈的争论。专家说，别以为一个字眼之差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仅仅两个字就体现完全不同的含义——回报是一个市场主体正当合理的预期，而补偿只是某种损失的补救。

教育部原专职委员、原国家副总督学郭福昌不无忧虑地指出：多年以来，国家办教育的观念已经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社会上歧视民办教育的现象很难随着一部《民办教育促进法》的颁布就消除了。

人人都有权利享受九年义务教育，民工子女也一样。政府要民工子女享受义务教育的做法就是围追堵截，驱赶他们进公立学校，要他们缴纳昂贵的费用。明知民工本来就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每个民工家庭都是囊中羞涩，要让最底层的人民群众饿着肚子来为儿女缴纳他们不可能拿得出来的学费，这不是勉为其难吗？这不也是把纸上写的“义务教育权利”实际上搁到空处，让纸上写的东西最后变成空话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法律和社会保障上存在什么漏洞了。

作为民办的平民学校，想从身为贫民的城市贫困阶层身上获取经济利益的空间非常狭小，小到几乎没有企业和社会组织愿意为此掏出一分一厘。既然有几个人愿意做点这方面的尝试，政府为什么不能给予扶持，反而要百般打杀呢？民工子弟学校对民工们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的事。姑且不论学校的教学质量是否赶得上公立学校，有书读就比没书读强。设身处地想一想，真的有一天把这些私立贫民子弟学校赶尽杀绝了，如此众多的民工子女往何处去？失学的孩子是不是也要加入他们的家庭“创造财富”？年幼无知就在社会混，对我们的社会能是什么后果？

民办学校于1978年前后出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民办教育开始复苏。进入21世纪，全国民办教育机构达6万多所，在校学生1000多万人。其中，民办幼儿园4.4万所，占全国幼儿园总数的25%，民办中小学7600多所。

与此同时，有资料显示，全国平均只有74%的小学生能够升入初中，只有48%的初中生能够升入高中，15-18岁的同龄孩子之中，只有42%的人能够接受高中教育。这个比例对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来说是多么的低呀！58%的青少年竟然被关在高中的大门外！有幸读上小学的孩子，26%的读完小学后就被赶出学校，流落社会！还有多少孩子是连小学门都不能进的呢？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我们的民族还有多少文盲？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盲能不能不再后继有人呢？

一个民族要想振兴，要想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败之地，就不得不面对并且真正解决这些问题。

据悉，北京有400多家私立民工子弟学校，大约有9万多民工子女在这些学校读书。这些学校从办学之初就生活在夹缝中，时时面对“非法办学”的包袱。

广东省民办教育促进会会长王屏山认为，对外来工子弟学校的硬件不应该苛求，只要够用就好！他说，如果政府觉得它们的条件不达标，应该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而一律取缔只会造成“新一代的文盲”。

广东外来工子弟学校在全国先行一步，但简陋还是大多数学校共同的特征。就是这样简陋的条件，不少学校都人满为患。广东的外来流动人口接近4000万，主要

集中在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城镇，应该接受教育的外来学龄儿童约有 130 万，并且呈逐年上升趋势。东莞在中小学就读的流动人口子女达到 15 万人；深圳更多达 33 万人。

广州外来工子弟学校已经达到 103 所，在校学生 3 万多人，应接受教育的外来民工子女至少有 10 万以上。一些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办的学校，招生规模在短短几年中连翻几番，许多学校建校时只有二三百名学生，现在达到了 1000 多人。还有一种“怪”现象：越是条件差、收费低的学校，就读的人越多。其实，这种现象说怪也不怪，民工家庭没有足够的钱来交学费，因此只好让孩子委屈点儿，在简陋的学校读书。就是这些简陋的学校，接受了当地 70% 以上流动人口的子女就读。

无论哪个档次的民办贫民学校，都有一个共同点：低投入的设施，低工资的教师，低收入的民工子女，民工学校教师的工资只有当地公办教师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

民办同仁学校的姜校长说：学校老师到了结婚年龄没钱供房，已婚的子女安置也成难题。该校办学 8 年，老师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现在只有 5 个老教师没有跳槽。姜校长说，很多孩子聪明极了，只要有好的条件，就会成为栋梁之材。

让我们看看记者采访的实录，了解这些学校的状况：

名叫东城小学的学校靠近铁路边，狭窄的院落西面是教室，北侧是简易棚，没有操场。走进教学楼，由于光线的昏暗，我们只得小心翼翼地抬脚。走廊的尽头黑咕隆咚，教室里桌椅破旧，光线很暗，黑压压地挤满了学生。

每隔 30 多分钟，距学校不到 30 米的铁路线上就有一列火车呼啸而过，1000 多名外来农民工的孩子，就在这轰隆隆的声响中度过每一天的学习时光。

一旁是轰隆隆的火车声，一边是几乎不能隔音的几间教室同时传出的读书声，我们的交谈其实就是高声叫喊。

在许多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老师上课就靠一支粉笔、一块黑板，学生的活动场所根本没有或极为狭小，没有基本的实验仪器，没有体育、音乐、美术课的器材教具。有的即使有，也因为没有场地或专用教室而束之高阁。

正是这样简陋的学校，也培养出了不少人才。广州东城小学的一位同学，去年获得广州市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二等奖。广州同仁学校更是人才辈出，2001 年有 4 人获得全国小学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一、二、三等奖，同年又有 5 个同学获得全国第八届“华罗庚杯”少年数学邀请赛一、二、三等奖。

上海宝山区月浦镇有一座安南学校，像其他学校一样，行人从围墙外就能看见校园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不一样的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全部都是外来务工家庭的孩子。

在安南学校，少先队组织是自发成立的，没有上级、没有指导、没有管理。算是“三无组织”。孩子们的思想品德课本，还是从安徽倒过来的“舶来品”。要不是在报纸上偶然看到，安南学校的师生至今也不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因为没有任何部门向这所民工子弟学校传达《意见》精神。

安南学校少先队组织是自发建立的，校长李如康说：“学校非常想把少先队工作抓上去，但缺乏上面的有效指导，工作不知从何抓起。建校 7 年来，上海市各区、

镇少工委从来没有和我们联系过，而专管青少年犯罪的上海市青保委却把我们纳入管理范畴。上海市教委从来只管学校的交通安全和卫生，对其他工作一概不过问。”

安南学校少先队辅导员陈代象老师反映：“信息太封闭、又缺乏上级统一管理，想把少先队组织建好，只怕心有余而力不足。”近 50 岁的陈代象来上海已有十年，此前是四川省雅安市农村的一位民办教师，有多年少先队辅导员经验。他对记者坦言，他现在承担的少先队组织工作，仍然是按照十年前在四川老家的办法，新队员举行入队仪式、背诵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定期组织学生进行文艺活动。

就在同一座城市，上海公办学校的少先队工作十分活跃，广泛开展“快乐中队”这种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但这样的活动，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民办学校是无权参加的。

安南学校为进行德育教育，开办了黑板报，学生、老师都积极地写文章。没有上级的指导，学校凭借经验自发组织一系列德育活动，如“三八节我帮妈妈做家务”，“红领巾监督员”，“红领巾广播站”。每周一早晨，校长还在学校升旗仪式上进行简短的周总结，表扬先进少先队员等等。学校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很积极，每天都举行升国旗仪式，升国旗也是安南小学课本以外唯一的爱国主义教育形式。

这对于一个民工子弟学校来说，真是不容易。没有地方政府的关心和支持，没有社会组织和企业关心，甚至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不对他们开放，他们却在自发地做这一切，那是多么地不容易。

“红领巾监督员”也是学校里表现优秀的少先队员。安南小学五年级学生蒋薇作为学校“红领巾监督员”的一员，当记者问她国旗上五颗星代表什么？红领巾象征什么？她说不清楚。来上海近 5 年，蒋薇只到过市中心两次，更别说去参观上海博物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单单看到东方明珠，就让这个孩子兴奋了许多天。她说：“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和城里孩子一样，进少年宫看一看，哪怕就在宝山区少年宫看看也很满足。”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穷孩子的心愿，也没人来帮助她实现。我们的社会不感到羞耻吗？

五年级学生周冰倩说：“我的数学好，希望能有一天和上海小朋友一道参加各种知识竞赛，为学校争荣誉。”这个孩子要求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要求公平的竞赛环境，可他却不得不生活在不公正的社会里，这不是对我们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嘲讽吗？

目前，民工子弟学校之间相互开展了一些体育竞赛等校际活动，但是请记住这么一个事实，私立的民工子弟学校和当地公立学校之间仍然是“老死不相往来”。

这除了教育体制的束缚外，说明我们陈旧的教育观念的偏见是多么地狭隘、自私、可笑，而且对我们民族培养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制造了多大的藩篱！

孩子们很穷，孩子们很弱小，但是孩子们的心灵一样很美。即使他们就读的学校是这样的简陋以致公立学校看不上眼，民工子女们还是从心里爱自己的学校。他们的老师也爱自己的学生。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穷一点儿，但是一样富于童真的孩子是怎样真实地生活，而他们的学校又是怎么来爱护他们的。

“有一回，我骗取爸爸 5 块钱去打游戏机，没想到被妈妈当场给抓住了。回到家，妈妈一声不吭抓起我就打。妈妈竟然拿起真家伙—把菜刀，朝我的脚一刀砍下去。我

赶忙用手捂住伤口，鲜血从我手缝中流出来。妈妈一看血就愣了。妈妈赶紧从屋里取出一块纱布，涂上药水包扎在我伤口上。”这是六年级学生魏重炜在作文中写的一段话，他在作文中问：“你说我妈妈坏不坏？”然后又否定道：“不，她只是性子太急了。”

林金生在编《妈妈的爱》这本小册子时，看到魏重炜的作文犹豫了一下，文章有点“暴力”，会不会影响妈妈的形象呢？

“最后，语文组的老师觉得它比较真实，能反映我们学生的情况。”林金生说。他所说的“我们学生”，指的是在厦门市外来员工子弟学校就读的学生们，而林金生就是这所学校的校长。

在这所学校就读的，几乎全是外来打工者的子女。这些孩子，跟着父母，坐着火车或长途汽车，来到陌生的城市。他们的书包里面，塞着衣服，还有课本。他们想在这里读书，想在这里成长。他们没有当地户口，他们的父母文化一般不高，他们的家庭要靠打工来维持生活，他们的成长需要有人指导。

据估计，在厦门像魏重炜一样的外来人口子弟约有3万人。厦门市的第一所外来人口子弟学校诞生于1999年，即是上面提到的厦门市外来员工子弟学校。民办子弟学校好就好在为贫民着想。校长林金生回忆报名时的热闹情形，感慨地说：“不要任何证件就可以报名上我们学校，当时家长们都高兴得不得了。”

由于民办学校要达到教育部门的办学标准，就得不断投入，又没有政府任何补助，办学成本不断增大，因此每年学费都在增加，再加上校服费、书本费等费用，在条件稍好的学校就读每年至少也要数千元，条件较差的一年也至少要一千元，这令收入本来就不高的外来人口家庭也会望而却步。

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对民办学校课以繁多的税费，而“重点”公办学校在享受财政拨款的同时，明收学费、“借读费”，暗收“赞助费”，收支不明，也不交税费，这也是让民办学校感到的不公平之一。

政府要求外来工学校有良好的软硬件，却不让他们享受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无奈之下，许多民办学校成了无牌“黑户”。教育部门的解决方法是勒令停学，一律取缔。但这些学校为了把学办下去，只好和政府部门打起“游击战”。一位外来工子弟学校的校长说：“如果按公立学校标准来要求我们，我们提高办学成本就必然会提高学费，让外来工子弟上不起学，也等于是将这些孩子推向失学！”

目前民办学校大多是小学，由于资金与条件限制，初中不多，因此一些学生小学毕业后无法升初中，民工子弟要想进一步读高中，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东莞长安镇以市级学校标准创办的东安中学，投资2000万满怀信心要打造出一所初中名校。他们天真地认为：全镇流动人口70万之巨，应该可以养活一所优质的学校。这所学校的物理实验室，全套实验仪器安装到桌；化学实验室安装了专业排气设备，几十人同时做实验没有丝毫异味；标准运动场；宽带接入校园网。楼道、走廊宽3米，一千多学生同时下课不显拥挤。

学校考虑到由于学费较高，很多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读不起，就把目标定位在做生意的外来工和白领阶层的子女，如今却突然发现：他们的学校成了一个“孤岛”。不是因为别的，是风险来自于教育体制，他们属于体制外办学，政府不给他们任何支持，公办学校不收他们的毕业生，也不给他们输送学生，他们只能在夹缝中生存。

这说明，尽管私立学校有的办学条件也不差，但是你一样要被现存的教育体制打杀。

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动人口子女初中毕业后的去向问题越来越突出。

广州信孚教育集团每年均有近 600 名初中毕业生，许多学生毕业时还不满 16 岁。前两年学校作过专门调查，本来 80% 以上学生及其家长有升学愿望，但是由于将来只能回原籍高考，很多人在初二就转学或放弃学业进入打工行列。

学校的校长周国明说：学生流失高峰都出现在毕业班的下学期。春节过后，毕业班有三分之一的学生不来了。流失的一部分是班上最好的学生，一部分是觉得前途无望的差学生。两年半来一直满员的教室，顿时空落落的。因为外来工学校没有高中，公办高中费用又贵得惊人，现存的考试制度是学生必须回原籍报名考试。种种限制和压力，使家长让孩子读书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梦，除了少数有条件的学生可以回原籍参加中考或高考外，绝大部分学生从此失学了。

信孚集团 5 年前开始申请办高中，但一直未获批准。他们设想搞“高大衔接”：学生高中毕业后以成人大学、电大、自考等办法攻大专，绕过正规高考关。但年年申请，至今未获正式答复。

信孚集团的董事长信力健表示困惑：普通大学已经招生不满，为什么不可以给成绩优异的民工子女一个机会？同样是民办学校，为什么高收费的贵族学校就准许设立高中，低收费的平民学校就不准许。

广州市现代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张铁民说：“能否享受教育的权利，是一个人出生以后对社会公正与否的第一次切身体会。城市今天的傲慢与冷漠，可能为明天付出惨重代价。”其实他说的不彻底，所谓城市的冷漠，不就是政府对下层人民利益的漠视吗？

现实让这些孩子处处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外来人员子女渴求的其实不仅仅只是读书，在城市的天空下，他们更渴求的是通过读书融入到这座城市中。然而体制决定他们是城市的“边缘人”。

在民办学校读书的学生与公办学校的学生看起来没什么不同，一样的活泼、一样的天真、一样的娇嫩可爱。可是，因为学校不同，他们将来的人生轨迹与公办学校的学生相比，将会曲折得多，艰辛得多。

“远离自己的家乡，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们同样渴望知识的海洋和明媚的阳光……”一所民办贫民学校的校歌这样唱。

我们以为希望工程只在贫困的山区，我们关注那里的儿童怎么读书，其实除了贫困山区的儿童，在城市的角落，在城市的最底层，也需要希望工程，边缘地带的儿童也渴望同在一片蓝天下，享受知识的阳光。

如果我们坐等所有的措施都到位，坐等所有的学校都有一样的能力了，才准他们办学，到那时，很多民工的孩子可能已永远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紧迫感。实事求是，我们就应该看到这种紧迫感。

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很能说明民办教育的处境：沙丁鱼在运输过程中易死亡，放入一条鲶鱼，沙丁鱼马上被激活。民办学校创办如鲶鱼激活了众多公办学校，如今被激活的“沙丁鱼”反过来围攻鲶鱼。如招生，历来划学区为牢的名牌公办学校，现在开始以赞助费为诱饵向学区外学生频频招手；或者干脆联手成壁垒，搞公对公的对口升学，限制学生升入民办学校。

另一个误区是，民办学校办成了应试教育的翻版，成了公办学校的预备队。有的民办初中墙报上，赫然张贴着全校学生考试成绩的“排行榜”。有的校长甚至说：“民办学校如果在各种会考中比拼不过公办学校，还怎么生存？说到底，考还是法宝。”这是在忍受政策歧视、社会歧视的同时，民办教育还得向“现代科举”靠拢，以求在应试教育的评估体系中生存下来。这样的教育前景真是可悲！

这是一种扭曲。这种扭曲注定了民办教育踉踉跄跄，一路艰辛。

一位记者这样写道：“在采访的民办学校董事长、校长中，我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在谈到创业的艰难和地方行政干扰带来的种种困境时，他们大都进入了悲壮的殉道者角色。一名年轻的校长甚至愤激地发问：‘假如政府总以规范为由打压民办学校的话，干脆全部封杀民办教育好了，又何必挂出这样的幌子！但事后，他们总是再三叮嘱我，写文章时千万不要太尖锐。他们还要在人家的眼皮底下谋生。其态度之低调让人唏嘘不已。’”

“我们像黄鳝一样躲来躲去。”一位教育集团董事长直言不讳地说，“教育行政干扰对民办教育的发展已构成实实在在的阻力！”

在政协浙江省八届四次会议上，浙江大学教授袁加勇指称，浙江的民办学校遭受不公待遇严重，有的人、有的政府部门甚至抱有歧视的态度。民办学校在教师聘用、教学用地、资金筹集、学生招收等等方面，都没有享受到与公办学校同等待遇。民办学校在申办及以后的办学过程中要接受各种各样的检查、验收，不达标不行。但这些检查、达标的标准都是按公办学校标准来制定的，并不符合民办教育的实际。浙江民办教育在全国走在前列，不论是办学模式的探索，还是政府给予的积极推动，都算是体现出观念的突破了。其政策环境尚且如此，那么其它地方就可想而知了。

民办学校不仅在其他方面受到歧视，就连招生本来应该是最基本的起跑线，也遭到打压，学生到民办学校就读，不算升学率。

教育权利和人身权利一样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可是，让人奇怪的是，在现实的操作中这种平等权却无情地被一些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给人为扼杀了。

教育是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大事，不论是谁接受教育，不论在哪儿接受教育，那只是过程的差别，升学率就不应有公办和民办之分。从教育的价值取向来说，升学率是衡量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一个学校的升学率都被行政部门规定不予承认，事实上就是在扼杀这个学校。

浙江省民办教育协会的专家透露，虽然浙江省早就明文规定，招生工作要公正、公开、公平，学生有选择学校的自主权，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遭遇“阻挡”。有时民办学校开一个招生会，都要经过批准，否则，校长、班主任就不敢参加。有的地方甚至规定，学生到民办学校就读，不算升学率。某县一所私立学校为了招收一些品学兼优的困难学生，决定让他们免费就读，被当地主管部门视做“扰乱招生秩序”，受到通报批评。

深圳有一家报纸兴高采烈地报道，因为他们报道了小学生黄玉珍放学遇车祸致死的消息后，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受害人就读的永成学校被南山区教育局等有关部门依法取缔。这家报纸说，永成学校位于深圳市南山区，不经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就非法办学，招收了千余名学生就读。学校管理混乱，基本设施落后，终至酿成了一名小学生放学被车撞死的惨剧。

在我生活的城市，每到小学上学和放学的时候，都有交通警察在学校门口指挥

交通，维持秩序。当然这些都是公立的小学校，私立的就没有这种待遇了。由此想到，要是私立的学校，也有交通警察像维护公立学校这么去维护秩序，会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呢？更进一层想，要是公立学校出了交通事故，车祸致死一名小学生，这个学校会不会被取缔呢？新闻媒介又会不会是如此兴高采烈的报道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可以看得出我们对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是多么的不公平，是多么地泾渭分明。在这种不公平的环境中竞争，私立学校何其难也！

昆明创新学校位于昆明市赵家堆，当这个学校挂出红色的标语“热烈庆祝创新学校成立3周年”的时候，有的报纸也报道这所民办学校是所“黑学校”。

报道的报纸说：

走进这所学校，一幢3层高的小楼就是学生的教学楼，非常简陋。操场空间非常狭小，20多个孩子就几乎站满了操场，因为是课间，孩子们在操场上快乐地玩耍着，对于周围的环境，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有何不妥。昏暗的楼梯，阴暗的教室，与孩子们阳光般的笑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走上楼梯，每层楼大约有9间房子，面积都很小。1楼有两个学前班、1个一年级班的教室，校长室和老师办公室共用了一间。2楼有二至六年级的几个班。上课铃声响了，孩子们鱼贯走进教室。里面光线很暗，课桌椅都是大大的一张，已经非常陈旧了，一排课桌坐着五六个孩子。他们睁着大大的眼睛，很认真地跟着老师读书。

该校的校长王德亮说：“我校早在2001年4月份就在这里办学了，申办学校的相关材料已递交了西山区教育局，但一直没有答复，所以我们也照常招生。今年2月份，西山区教育局的有关人员到我们这里检查，并下发了整改指令书，我们按规定进行了整改，现在学校的合法手续还在审批中。”

就这样一个学校，是帮助她好呢，还是把她推入绝地，让里面就读的学生失学好？须知，如果有足够的钱，哪个家长不愿意送自己的孩子到条件好的学校读书呢？作为新闻媒介，动不动就给人戴上“黑学校”的帽子，是不是客观呢？

再来看一个报道：

恒园学校位于昆明近华浦路和西园路交会处的麻园村，有185名学生，这些学生的家长全是租住在麻园村一带的外来人员。

走进学校大门，迎面一排石棉瓦搭成的平房便是教室，每间教室面积约10平方米，由几排简易课桌椅和一块黑板组成。每间教室的门头上都悬挂着一块写着“班次”的小木牌，学校设了一至七年级和两个学前班，共9个班级。教室一侧有一幢两层楼办公楼，是“恒园学校”的办公区和教工住宿区。

“恒园学校”是兄妹5人共同出资，其中妹妹宋丽占最大的股份，被推举为校长。目前，包括他们兄妹共有16名教师，加上其他教工勤共20人，宋老师称，所有老师都有教师资格证。

校长宋丽26岁，1998年毕业于云南省广播电视大学昭通分校师范班。她说，自己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麻园村周围分布着4大农贸市场，外来流动人口较多，生源十分广阔，她才决定将学校办在这里的。

据介绍，该校在房屋租金、校舍环境改造、教材、桌凳、办公用品及教职工工资等方面累计投入已达20余万元。由于投入过大，短期内学校仍处于亏损状态。但宋丽表示，亏损并不影响办学，他们“能借到钱维持学校的运转。”

学校招生时打出这样的启事，“已在其他学校交了预交费的可来本校减免预交

费就读；在2月25日前交清费用的，免费赠送校服一套。”为证明自己的实力，“恒园学校”从2月2日起，免费为学生补习一些课程，以此吸引学生家长前来咨询、报名。

区教育局在今年3月初专门到该校举行家长座谈会。学校说将邀请40位家长到会，但实际上参会的学生家长只有10余位，很多学生家长借口“忙做生意”而中途离开。会后不久，区教育局收到了由七八十位家长共同签名的“联名信”，信中表示他们对“恒园学校”的办学质量表示信任。

这又是一所被称为“黑学校”的私立贫民学校，同样面临被取缔的威胁。兄妹五个人集资为外来民工的子女读书办个平民学校，仅这一点精神就够毛主席说的“为人民服务”了，为什么不能对他们的举动报以点同情心呢？

和全国各大中城市一样，昆明市的公办学校目前也无法满足现有的外来人口子女入学。仅以西山区为例，全区人口62.9万人，然而外来人口却多达29万，按照外来人口子女的入学比例，约有3万人就学。

北京行知学校是所有750名学生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因未能交齐7万元房租，出租方贴出了“封校通牒”，换了大门锁，禁止学生进校上课。面临失学的孩子们对着被锁上了的学校失声痛哭。

这时有9名清华学子和20名北京四中高中生到位于大兴区的这所行知学校，给这些农民工子弟带去大约3000册书籍和两台电脑及一些教学用具。

清华学子和四中学生到在行知学校读书的民工子弟李刚的家，看到他们一家恶劣的生存状况后，不少人落泪。李刚还有3个姐弟，家住垃圾场边，父亲少一条腿，母亲患白内障。清华“笃行社”社长、该校大三学生姜慧雨说：“满屋子苍蝇，全家人吃从垃圾场捡回的东西……我们除了震惊，还是震惊。这是震惊的一天。再也不能让他们这样生活下去了。”

像这样家庭的孩子，如果不是行知学校这样的民办学校让他跨进校门读书，在今天中国大陆还有什么学校会接受他们读书？能有什么公办学校会免除这样的穷孩子的学费，同意他们坐到教室里上学？

据了解，行知学校一直坚持对李刚4姐弟免收学费。校长黄鹤说：“有社会各界人士关心，办好学校我很有信心，但学校目前确实遇到了困难，因为未交7万元房租，明天将被封校。出租方大兴区供销社职工学校已下了最后通牒，让学校5月24日搬走，此前学校已搬迁过5次。”

这个学校感动了一个老红军，老人捐赠了3.6万元钱给他们，不过这也只是“杯水车薪”，还不知道出租方能不能先收部分房租，给行知学校一点儿时间去筹钱，好交房东的租金，让穷孩子们能有个读书的地方。学校临时党支部书记王宝才说：“出租方昨天晚上已贴出封校告示，换了大门锁，我们正在交涉，实在不行，只有让学生回家等消息了。”

值得庆幸的是，在事后一段时间，经过有关方面的协调，行知学校的大门又得以打开了。但愿孩子们能不再提心吊胆地读书。

具有同情心、善良、讲信义，这是每一个想受到尊重的人应该具有的品格。而我们的社会，对自己的后代，无论贫富贵贱，应该一视同仁，多一点爱心。如果说到帮助，那么最应该得到帮助的正是那些穷孩子和他们的家庭。这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人道的标准之一。

就民办学校的问题，让我们来听听厦门教育局有关人士的一点意见，也许是会有些益处的。

厦门市教育局社会教育管理处处长黄杨说：“厦门市的外来人口有 74 万，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厦门岛内，而岛上的常住人口也就 56.54 万。厦门的外来人口太多，外来打工者很少会再回去，小孩长大了就是这个城市的市民和建设者，现在教育不好，会给这个城市未来带来负面影响。取缔行动只能激起外来人口对政府和城市社会的不满。在政府管理部门与民办学校的关系上，政府占主导地位，要堵容易，但更重要的是依靠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来加以疏导。”

在中国大陆，一方面是教育供给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由于资金绝大部分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社会总体消费乏力。教育消费已成为逐渐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人的新卖点、热卖点。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家庭，不惜重金去选择学校、选择专业、选择教师。教育市场就在不断的“选择”中扩大了。不少家长甚至愿出资几十万元，让孩子远离故土，出国读中学，甚至读小学。我们忽视了国民的教育需求，让我们的家长拱手送出大量的资金帮助外国办学去了。

民办教育的大发展，将大幅度地相对增加国家教育财富总量，是当前社会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对教育需求的激增，国家单一的投资渠道日见乏力，近年来民办学校兴起与发展的实践证明，钱是财富，是教育的必要资源，但观念政策也是财富，也是可以转化为教育资源的。陈旧的观念不转变，也会成为教育发展的阻力，这是不言而喻的。

世界银行的专家曾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最大不平等就是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不公平，少数人占用了过多的教育资源，培育了少数尖子，但损失了全民素质。

这真是悲哀。但愿这样的状况再也不要继续下去了。